

日本教育改革的问题^①

一、文部省是不能依靠的

日本的教育存在非常奇怪的问题。如果听到过许多学校都发生“学级崩坏”现象后，就会深有同感。所谓“学级崩坏”，即在小学的课堂上，一些学生无视老师讲课，随便下座位乱走，喧哗，几乎无人听课，致使正常授业不能进行。另外，学校内集团性的以强欺弱和“不登校”^②的现象已被视为不用大惊小怪的普通现象，也不再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了。甚至连学生带刀上学，刺死教师事件，也都是暴力日常化问题的九牛一毛了。

中央教育审议会(中教审)，面对以上现状，提出的教育改革方针是：增加学生的休息时间，以放松过度紧张；同时加强“生存能力”和“心的教育”。为达到以上方针，中小学的教学内容被砍掉了三成，使正常的教学速度跟不上；对那些失去学习目的和干劲的学生们，反而让他们努力去掌握什么“生存能力”；同时为了避免因入学考试的竞争使紧张的人际关系(学生间)走向最后的爆发，又提出要进行什么“心

① 原载《季刊ΣATELO998—秋》第110—120页。TBS-Britanika, Co., Ltd. (原題：「めげず選択・責任・連帯の教育改革」)

② “不登校”——越来越多的学生(3%—5%)长期无故不到校，长达几个月至几年，以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为最多。

文系 50 人

おまけ・「いい大学 先生で選ぶ理系文系 100 選」『AERA』第 17 卷 5 号通巻 847 号
P37 朝日新聞社 2004.2.2 発行

研究者名

得点

橋爪大三郎

26.5

大学学部学科名
センター試験
ボーダーライン・満点
2 次試験
難易度・偏差値
コメント

東京工業大学
82.2%(222 点) 270 満点) 62.5%
キリスト教、仏教、イスラム教、儒教
などの論理構造と本質を説明、教
育政策にも発言、著書「日本人は宗
教と戦争をどう考えるか」

『大学ランキング2004年版』(朝日新聞社)の「メチアへの発信度(総合)」を基に作成した。ただし、①理系、芸術系の研究者②学部生を担当しない大学院、研究所専任の研究者③大学以外への転出予定などがある研究者や故人などは除いた。点数は12年間の主要紙書評欄で書きわかれた論文数④各紙文化欄や雑誌に掲載された論文数⑤各種新書・選書の執筆冊数——などを、一定基準に従ってポイントに換算して算出した。研究者の正式所属は大学院の場合がある。表では、判明する限りで主に講義を受け持つ学部・学科を表示した。入試データについては、理系の表を参照。

大学 MBA 的神話

D A X U E

的教育”。但遗憾的是，这只能是对症疗法。表面看来，好像比什么都不做好些。但如因此而拖延了最基本的改革，实质上是有害的。

对被入学考试的竞争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学生们，给予所谓的休息来放松其紧张，就好像是，先缚紧脖子，到快窒息时，稍微松开一点。其实无论是所谓的“太紧张”，“没有生存能力”还是“生病的心”，都是由现存教育制度造成的问题。对此，不从制度本身着手解决，不追究那些制定制度的人的责任，反而一味地要求学生去拼命努力，这是特别不负责任的。

对教育制度问题要负首要责任的是文部省审议会。但除了只能提出什么“对症方针”以外，简直不能再对其寄予什么期望。文部省甚至面对如此严峻的教育危机，连追究原因的最起码的勇气都没有，还谈什么根本解决方针呢？因此，我们国民只能依靠自己，从基本开始，提出改革计划，同时造成庞大的舆论影响来达到教育改革的实现。

二、缺乏连带，学校质量下降

首先必须清醒认识的现实是：学校作为教育机关而不能履行其职能。所以教改的目的是，认识学校是教育机关，和恢复学校的教育职能。

当然，学校现在也在进行着所谓的“教育”，但同时又将其空洞化。例如，首都的中学，初、高中一贯制的私立中学越来越受欢迎，尽管学费昂贵，约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学生还要考私立中学。大部分的公立中小学的学生们还要利用课外时间上补习班，预备校等。因为家长都坚信，如果只靠上公

立学校；不能达到将来升学时必要的学习水平和能力，而且这确是事实。所以公立学校的学生需要相当一部分的教育费用用于补习班、预备校和家庭教师上了。这不是家长们对公立教育的不信任又是什么呢？

在过去的历史中，公立教育曾履行过其职能，即使截止于战后(1945年后)高中升学率不高，能升入大学者，经过选择就更是少数人的时代。所以从公立高中考入国立大学，对出身不富裕的家庭的学生来说是惟一的路，也是自豪的路。

但高度经济发展以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急速普及，形势大改，现在高中升学率已超过百分之九十六，可以说全体初中学生都可升入高中。大学升学率也已达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大学院的升学率，近十年内，也是急速上升趋势。高学历化的结果是出现了子女要超过父母的学历已越来越困难了，而且，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威信也随之下降。以前那种尊敬有大学学历的教师的情形已看不见了。另外，伴随消费社会的发展，家庭教育能力也大幅度低下。出现了对孩子们“过保护”，和与此正相反的“不关心孩子”的现象，造成了缺乏严格正统家教的“自我为中心”的，没有忍耐力的孩子越来越多。

但实际上，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是在不断地提高，因为原来需要的那种适应单一劳动人材的产业社会本身发生了变化——即高度化了。所以对能适应情报化，有个性，有创造性人材的需求开始了。高科技创国，立国的科学技术基本法成立了。据研究，对有开发能力的理工科出身的科学技术人员的需要越来越多。

事实上，学校水平下降，就是由于缺乏连带。所谓连带——“Solidarity”(中文为“团结”)是社会学用语。意思是

建立协同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信赖”。为使组织有效地发挥其功能,牢固的连带是必不可少的。

而现在的教育制度,由于破坏了学校的连带而造成的。学校像一盘散沙,我曾有机会与一位校长谈话,他说:“我校一位英语老师发音太差,学生们几乎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听了学生们的反映后,非常为难。”我问他:“当然要批评这位教师了吧?”“作为校长,怎么能说呢?”“那其他教英语的同事们呢?”“同事们?那就更无法提什么批评了。”就这样,无论其教学能力多差,只能放任自流,对学生极不负责任。

教师之间互不关心,对旁边的教室,别人的讲课,从无人多言。校长更是根本不能掌握每一个教师的教学情况。学校内无论发生了学生之间的以强欺弱,还是教师的违法乱纪等问题,校方总是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反而从什么“前例”,“上级文件”“校则”等找推脱的借口。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与其说是教育者,不如说是管理学校的官僚。

校长与教师之间互不信任,家长们就更无法信任这样根本不能形成一股劲的学校;相反,学校方面也不信任家长们。教师和学生也互不信任,像这样,严重缺乏信赖——连带的学校还要维持最起码的形式,就只能依靠学校的学生档案和该校的校则。

这种情况下,让家长对学校提出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是根本不可能的。学校对此也不欢迎。正像文部省和教育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这是由于学校不能正常运转所造成的。“PTA”(家长教师会)这时就只能流于形式,因无任何实质

268

性权限,家长们都无精打采,谁也不愿作什么其中的具体负责人。但作为可以控制学生成绩和升学的学校,把学生作为“人质”,在家长的面前,学校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和战后不久相比,孩子的集体活动越来越少。原因是汽车、电视、少子化和升学的竞争。孩子王没有了,某局部地区的孩子们特有的游戏文化也没有了。失去了连带,局部地区的“社会”又解体了,只有学校反而相对地重复和增多了。那些不被学校接受的孩子们,或与学校格格不入的孩子们,就失去了可去之处。

三、在家长教育权的基础上,重建学校

日本国民,有史以来的一大错觉,就是国家应掌握教育大权。

虽然建立各种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的是文部省,但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却只能是家长。所以,要明确的原则是,学校是受家长委托而运转的。在此原则下,要明确指出责任所在。

为达至以上目的,废止学区制是必要的。

公立中小学,是按学区而设的。住此区域的孩子们决无选择他校的余地,只能上规定学区的学校。最近,虽说有个别例外,但绝不是家长可自由选择学校。作为学校方面,同样没有拒绝学生入学和勒令学生退学的权力。所谓学区制,就是无论哪个学校,都要以完全相同的教育为前提,检定教科书和学习指导提纲,即何时,教何内容,全部由文部省统一控制。这样就扼杀了各学校及各位教师的创意和现场发挥。

如果废除了学区制,家长可自由选择学校。当然作为家

269

长,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具有高质量教学和可信赖的教育方针的学校。因此,各学校间在教学质量上会产生竞争。尊重家长的教育权,首先必须尊重家长对学校的选择权。

另一重要问题是:校长要掌握学校经营权。

校长要具有决定采用教师的人事权;决定经费使用的预算权及制定教学计划的教育课程权等能使教育水平提高的任何权限。原则上校长是通过公开募集制,受到教师组织推荐的校长候补者,学校以规划书形式向家长们说明后,最后由家长投票选出。由于教师又是由校长选拔的,就一定会对校长的教育计划鼎力相助。校长还根据需要对教务主任以下的教师具体安排工作,所以权限和责任分工非常明确。一定的年限同(3—5年)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或没有提高教育质量,校长将替换教师队伍;对校长的评价和任选是否继续则由家长代表和地区权威人士组成的“学校理事会”作出决定。

按照以上做法,被德高望重的校长聘请的教师将会以作为教育家而自豪,社会威信也会提高而受到尊敬。而且由于学龄人口的减少而造成采用新教师的减少的现象可因此制度而增加那些愿意献身教育事业的年轻人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兼职教师和非专职教师将加入教师队伍,使其增加新鲜血液。教师之间的连带会随着有了共同奋斗目标而产生。如果学校达到了家长的所期待的要求,校长及其教师队伍将能继续留在学校;否则将离开学校。这样建立了家长与学校方面的明确关系,就促使学校作为教育机关而再生了。

但是现有的制度,教师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所以要使教育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就要支持和奖励那些有能力,勤奋的教师们。这也是教育改革的基本之一。

270

四、重新认识教育制度

战后的教育改革,是与六、三、三、四制一起开始的。(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在此教育制度持续存在的同时,矛盾也越来越深刻了。

战后仅有一部分初中生能升入的高中,现已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的升学率。这就是说,我们的义务教育实质上已延长至十二年了,但是,教育制度本身还是九年义务教育时的教育制度。初中与高中的课程设置是完全不衔接的,从初中升入高中必须通过升学考试。小学、初中为区级的,高中是市级的,设置主体完全不同。

在高中几乎是全体可以升入的今年,存在的最严重问题就是高中生质量明显下降(学习能力)。

由于入学考试是一种竞争考试,这样的考试并不能保证学生都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实际上早已在初中阶段,学生的学力就已拉开很大距离。在以后学校根据成绩分配高中时,就产生了由于偏差值而造成的差异,即按分数顺序从成绩最高的一流高中到分数最底的所谓压底高中。那些进了自己根本不愿进的高中的学生们,从入学那天起,就没有过努力学习的欲望。而且在这种压底高中里,入学者全是那些不是连小学的分数计算还没学好,就是连初中一年级的英语水平也达不到的学生,根本不可能进行什么名副其实的高中授课。即使这样,只要保证出勤不缺课就可以混到高中毕业。名义上是高中,其实不能进行高中教育的学校占相当的数量。由于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名不副实,社会上就出现了:人们重视

271

的是你是哪所高中毕业的。结果就更加剧了要考入有名高中,至少是前几名高中的竞争的恶性循环。

完全可以取消升高中考试。要保持高中的学习质量和促进学生努力学习,只需要高中资格考试。

取消高中升学考试的一个方法是:像私立学校一样,公立学校也要初中、高中一贯制;另一方法更简单,根据每个学生的能力进行针对性的教育,然后导入“高中资格检验”制度。以此挽救目前的教育。

高中学历低下是与小学、初中的“掉队生”现象有关。为什么会出现“掉队生”现象呢?这是因为忽视了学生间的个人差,而强调以班级为单位,以同一速度,教同一内容造成的。因为学生中的理解教学上分快慢是当然的,以同一进度教学时,理解快的学生感到没意思,理解慢的学生反而跟不上。其实,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真正理解所教的内容,对某些理解慢的学生,应放慢速度,多用时间,如果每人都以自己的速度学习的话,就不可能出现什么“掉队生”。

以班级为单位的齐头并进教课,对教者看来好像很有效率,但对被教者却完全不同。到现在为止,学生一直是在适应学校;从现在起相反地,学校应当去适应学生。为达到此目的,需要有个人的课程安排和以能力不同,速度不同的编班。为达到以上具体教育措施的实现,校长必须掌握学校经营权。

在此之上,导入“高检制”来取代高中毕业资格。

目前的高中成绩和毕业资格,完全是学校给的,即使学生学力不够,也照样毕业。与此不同的是,“高检”是学校以外的机构举行的资格考试。具有高中教育是否达到目标的客

272

观基准,这对高中教师和学生,是共同的目标。根据“高检”的水平的内容如何设定,来确保对进入社会后必要的基础学力。就好像司机开车上公路前要先取得“驾驶执照”一样,“高检”是学生走向社会作为产业社会一分子而工作的基础资格。有了“高检”这样明确的目标,学生就会努力学习,高中才能被承认为教育机关。

“高检”作为现在进行着的“大检”的代替和发展。从高中主要科目的基础内容出题(英语,日语,数学,理科,社会),考其达到程度。难易度为,优秀高中生进高中后半年到一年,最低学力的高中生也只需要3—4年时间可以通过的程度。有了此目标,初中以下的学生也能产生明确的学习动机。对小学、初中来说,只要上学不旷课就可以毕业,但高中必须改为要证明其学力。

“高检资格考试”与大学升学考试不同,得分不能成为资格取得的惟一根据。因为如果像大学升学考试那样最后得分由两次考试分数加算的话,就会造成争高一分,作无效的重复学习,像训练老鼠那样作反复转圈,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而“高检资格考试”,无论是谁,(甚至包括长期旷课的初中生)无论何时,都可以参加考试。关键在于取得能参加大学升学考试资格。

让学生通过“高检”取得合格证,是全部高中学校必须具有的教育机能。换句话说,只要高中具备此教育机能,教什么都由校长判断决定。对准备考大学的学生,可以教更高水平的内容;对低学力的学生,可以复习初中,甚至小学的内容。当然还可以为取得各种资格和职业教育而设置课程。有了以“高检”为核心的教育,就产生了具有较高自由度的

273

高中教育。学生会被如此有魅力的自由教育所吸引,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和目的选择高中。结果可使学生的根据不同学力而受到必要的教育。

五、大学改革的三大支柱

大学改革的三大支柱是:(1)取消入学考试;(2)充实奖学金;(3)公开募集研究员。

取消了入学考试,代替文部省规定每年学生人数的是,实施自由入学。在学中,不能达到基准成绩的学生要留年或中退。并不是到高中时都以齐头并进的学力来竞争,而是以大学专科的学力去竞争,这是既合理又不会使高中以前教育误入歧途。

大学首先要决定毕业时必须具备的基本学力和大概的毕业人数。然后再反过来计算,入学后半年及一年时,必须取得的单位(学分)和期末考试预想题,公布合格分数。想上大学的人,根据以上情报,找到适合自己学力并有可能毕业的大学、系,写入学申请书。同时要寄给大学的材料是:“高检”合格证书,其他第三机关发的成绩证明(如托福)等,高中成绩及其他该大学所要求的材料。大学方面回信时,通知学生如果入学后能取得何种奖学金及毕业的可能性如何。然后学生办理奖学金手续,付学费上自己选择的大学。有的大学如果担心会出现超过毕业人数几十倍的学生入学时的混乱局面时,最初半年改为通讯教育,通过提出报告书(论文)和期末考试成绩,中退一部分学生,使在学者可减少到几倍以下。第二年就不会出现混乱了。被中退的学生带着学分转入其他较容易毕业的大学。

274

要想自由进大学,原则上学生需付全部学费。如不这样会增加社会的负担。由于学费高出现在的几倍,可以奖学金的方式,从银行借钱,将来分期付款。这里重要的是,禁止家长替付学费,而是对学生本人进行长期借贷。由于这与借款买楼一样,学生本人就会很慎重地考虑上大学的利害得失。结果,对大学来说,凡是有一定学力并乐意自付学费的学生——即应上大学的学生才留在大学内,不该留在大学内的学生一律不存在。

奖学金是从最基本的分期付款类开始,随着条件逐渐优越而分为几个不同级别。根据大学成绩如何决定其得到奖学金种类的优劣。特别是,各大学都设有对占一定百分比的优秀学生,不仅免除奖学金返还,还发给现金作奖励的制度。此差额由政府补助。而现在的国立大学校费和个人助成金,由于直接交给了大学,对大学的教改和经营都无促进意义。如以奖学金辅助(或利息辅助)的方式直接交给学生的话,对学校及学生个人都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果没有学生,大学的营不可能成立。

现在的大学,因为只要进去了,就都能毕业。所以学生们在学期间无继续努力的欲望。这同时还因为入大学考试时的疲劳已达到了顶点。相反如要入学容易,不仅可保存精力面对大学的授课,再加上还有希望得到优等奖学金,就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无论是对社会发展还是对学生本人,都是再好不过的了。

大学教改的第三方面是:对外国人要平等开放教师及研究职位,实现研究环境的国际化。

美国的科学技术能保持世界最高水准的重要理由之一是,

275

吸引和集中了世界各国的一流优秀研究人材,经过公平竞争,这些外国学者们选择将来有就职可能的研究部门而决定读学位。然后,从博士后到正教授,教育研究职位是完全向外国人开放的。这与被日本人占据绝大部分座椅的日本诸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外国人开放教育职位,至少争取做到日本人、外国人的比率为各半。最低限度,领导日本研究先锋的一流大学和具有实力的大学,有必要这样做。否则,“科学技术创国”究竟是指何而言呢?研究职位向全世界开放的“研究开国”就是大学国际化的大胆实施。

六、以教育改革日本人的行动方式

近一百多年来,日本人的行动模式,确切地说是通过学校的教育被形成的。一提起现在的日本人,马上联想到的是根据学校教育而训练出的人们。难以想像在此之前日本人的行动模式是什么。

正是这样的从学校获得的行动模式,对日本的近代化和经济发展方面起了作用,但是对更高度的发展反而形成障碍。因为这样的行动模式剥夺了个人的积极性,使组织闭塞,这就阻碍了国际化。

过去两次(明治维新和战后)的教育改革,都是因为外国的压力而开始的。而现在需要的则是根据自努力力去完成的改革。这是对日本人自发地以再生产理论,改革自身能力的检验。

日本的学校教育,追求集团的同一化。以学年进度为准,无论是谁,学习进度相同成了原则。所以,以学年(加入此

集团的顺序)为基础形成的学生间上下级关系受到重视,学校没有承认个人差的余地,同时也无此必要。对能顺应此集团同化的学生,才能被评价为优秀学生。

这样的学校教育方法,是日本被地域文化和阶级差异所割裂,无共同根基时代的产物。在所谓的学校教育成功的今天,每个人都吸进了学校教育的同一性中,找不到自我基础反而成了大问题。

所以,选择和自我负责变得重要了。进大学,并不是同化命运的开始,而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本人学力,为掌握将来服务于社会的基本功而全身心投入。这样,在学校掌握的学力,只是为人类造福的诸多方法之一。在学校内,虽作为组织中一员受教育,但不等于失去自我。要保证进入和退出大学的自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选择和责任,追求最适合自己的提高学力方法。为支持以上目的,学校教职员,家长及社会要建立起团结信任的网。有了这样的教育环境,自己做命运主宰的新型日本人将会出现。

桥爪大三郎 (东京工业大学大学院) 张静华译

小泉首相の再訪朝に対して、橋爪大三郎^{はしづめ だいさぶろう}、東京工業大学教授は、『論座』2004年7月号「国交正常化を目的にしてはならない」で「外交的、政治的に成功しなかった」と断じている。小泉首相が家族の帰国を優先させたことについて、(1) 家族の帰国を待望する世論にこたえ、政権の浮揚をはかる (2) 国交正常化交渉の「障害」を取り除く—の2つの理由をあげ、国交正常化は日本の国益になるのか、と疑問を投げかける。「国交正常化とは、要するに、北朝鮮への経済支援である」とする氏は、日本にとって重要課題ではないと断言する。国交正常化は「手段ではあっても、目標で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とし、核や拉致問題を解決するためにはちたつかせるのはいいが、「北朝鮮のような核をもつ独裁国家に、日本への好意など期待すべきでない」「核をもつ独裁国家の存在自体が脅威である」とする。今後の外交立て直しについて、(1) 北朝鮮が核廃棄に応じないかぎり、国交正常化はありえないとはつきり態度を固める (2) 問題の10名をはじめ、拉致ではないかと疑われている安否不明者全員について、徹底説明を要求する (3) 世論の支持のもと、北朝鮮を制裁できるような法律を国会で成立させる—の3点を求め、さらに、アメリカと緊密に連携して核廃棄と脅威の除去を最大の目標として外交を進めるよう主張する。

In "Diplomatic Normalization Should Not Be the Goal,"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ofessor Daisaburo Hashizume says that Prime Minister Jun'ichiro Koizumi's second visit to North Korea "succeeded neither diplomatically nor politically." Hashizume gives the following two reasons for why Koizumi put priority on returning to Japan with the family members of Japanese who had been abducted by North Korea: (1) He thought that responding to public opinion would give his administration a lift, and (2) doing so was a way of removing an obstacle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ties. Hashizume expresses doubts, however, as to whether normalization is in Japan's national interest. "Normaliz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essentially means giving economic assistance to North Korea," he states, dismissing the matter as one that is not important to Japan. He argues that normalization "can be a means, but it cannot be an end," saying that while it may be acceptable to dangle the possibility of normalization to resolve the nuclear issue and abduction problem, "Japan should not count on the goodwill of a nuclear-armed dictatorship like North Korea.... The existence of a nuclear-armed dictatorship is itself a threat."

Hashizume gives the following three suggestions for refashioning Japan's North Korea policy. (1) Japan should take the stern stance that there can be no normalization unless Pyongyang abandons its nuclear program. (2) Japan should demand a thorough and complete investigation of the fate of all suspected abductees, including the 10 at issue. (3) With the support of public opinion, legislation allowing Japan to place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should be enacted by the Diet. Hashizume goes on to say that the foremost goal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hould be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 eliminat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and removing the threat it poses. ("Kokko seijoka o motometeki ni shite wa naranai," Ronza, July 2004.)